

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的经典之作

——重读《论持久战》

王 森

[摘 要] 如何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这是当前国际安全领域的热门话题,也是我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重温经典,可以获得启迪;早在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伊始,毛泽东就创作完成了一部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的军事理论巨著《论持久战》。它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把握时代特点,在扑朔迷离的战争中擘画军事指挥方略,在复杂多变的矛盾运动中洞悉抗战的本质、规律和趋势,在或明或暗的军力较量中彰显革命领袖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它不仅预见了抗战是持久战且最终必胜的确定性答案,而且描绘了持久战取胜的清晰轮廓。《论持久战》对于我们今天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仍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论持久战》;抗日战争;不确定性;确定性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新冠疫情的大流行、俄乌冲突等重大突发性事件与之交相叠加、激荡,使得“不确定性”已然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在此背景下,“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①如何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是当前国际安全领域的热点问题,也是我国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以典为范、以史为鉴,可获得启迪和信心;今天,我们仍有必要重温毛泽东在抗战初期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年代创作的这部照亮抗战胜利之路的经典著作《论持久战》,体悟其从不同维度的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的真理力量和现实启示。

一、时代维度: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把握时代特点

时代由时空、时事、时局、时势等一系列复杂多元的要素构成,而观察和分析时代,则是把握时代特点、破解时代问题的根据。自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我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经历了十个月战火的磨难,尽管当时中日战局、国共关系、国际形势都还处在极为动荡的不确定性之中,“亡国

王森,哲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际社会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认知及评价研究”(20BKS171)的阶段性成果。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6页。

论”和“速胜论”的言论也不绝于耳,但是,毛泽东为了在党的高层统一思想、系统阐明持久战方针、提高抗战必胜的信心,于1938年5月底至6月初,用了9天时间,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题为《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他以深邃的时代洞察力,通过对抗日战争所处的时代、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国际形势的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准确把握“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国进步和多助”^①这一时代特点,而这也是阐明为什么是持久战和为什么最终胜利的重要依据。

(一) 清晰指明抗日战争所处的时代

列宁认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②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③这点明了抗日战争所处的三个方面的时代内涵:一是,战争的时间是20世纪30年代;二是,战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展开;三是,这是一场敌我之间的殊死决战。

具体而言,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早在九一八事变时就已经拉开了帷幕。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难。日军为了达到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战略企图,实行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对华迅速增兵、进攻势头凶猛。在这场关系到民族存亡、国家危亡的殊死战争面前,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中共中央在1937年7月8日就通电全国,号召“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④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不仅促成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实现,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决心。古老的中华民族开始觉醒,中华儿女空前团结抗日,因此,毛泽东认为:就作战克敌制胜的有利条件而言,“历史上没有一个时候可和今天比拟”^⑤。

(二) 深刻把握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

毛泽东到达陕北后认真研读军事著作,“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⑥其中《孙子兵法》对创作《论持久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⑦

只有客观、全面地分析作战双方的特点,才能准确分析战争局势及其发展趋势。因此,毛泽东分析了中日双方相互对立的基本特点:敌之长处有一,即战争力量强;短处有三,即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小国:人力、军力、财力、物力不足,国际形势寡助。^⑧我之短处有一,即战争力量弱;长处有三,即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正义性,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国际形势多助。^⑨这些特点不仅决定了作战双方军事战略战术,也决定了战争是持久战且最终胜利必定属于中国。

(三) 彻底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

在抗战前,“亡国论”就已经出现。有人认为中国的武器装备不行,也有人持妥协态度认为“抗战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51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7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56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4页。

^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13—114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0页。

^⑧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8页。

^⑨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9页。

必败”“再战必亡”。^①进入全面抗战后,公开的“亡国论”没有了,但是在国民党阵营中,有人把抗战胜利的前途主要寄托在苏联以及美英等国的援助上,还有一些人盲目乐观轻敌而误以为可以速胜。台儿庄战役后,国民政府准备进行徐州会战,有人认为此役应是“准决战”。“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来自片面性和主观性的思想倾向,对抗战带来一定的危害。为此,《论持久战》予以了彻底的驳斥。

在批驳“亡国论”时,毛泽东根据前面中日双方四个基本特点的分析,指出:敌我“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决不会亡的根据”,并且“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是很多的,只须加上主观的努力,就能克服困难而争取胜利。”^②在批驳“速胜论”时,毛泽东指明没有谁不希望尽早把日寇逐出中国,但是“没有一定的条件,速胜只存在于头脑之中,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③因此,必须客观且全面地评估敌我力量,排斥毫无根据的“速胜论”。

(四) 准确研判国际形势的发展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养成了观察、分析和研究国际形势的习惯,擅长冷静地观察国际形势的变化,并从中探寻变化的规律与趋势。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更是敏锐地观察到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今天的世界的人民运动,正在以空前的大规模和空前的深刻性发展着”,“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④所以,中国抗战胜利一方面能够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团结御敌的榜样,另一方面能够积极倡导各爱好和平的国家共同建立起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早在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就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⑤毛泽东吃透了国情和世情,并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日本在国际上将失道寡助;与之相反,中国将得道多助,尽管当时还没有得到大量的直接的国际援助,但毛泽东笃信:“中国有进步和大国的条件,能够延长战争的时间,促进并等候国际的援助。”^⑥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世界各国共产党、进步人士和爱好和平的人们纷纷在国际上强烈谴责日本侵略,坚决支持中国抗战。

简言之,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正确地把握时代和分析时代问题,是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只有准确地把握抗战所处的时代及其内涵、分析时代矛盾的基本特点、不被错误的认识所左右、把脉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才能把握确定性的时代特点和方位,才能为制定正确抗战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提供“时代坐标”。

二、军事维度:在扑朔迷离的战争中擘画军事指挥方略

古往今来、横贯中西,不确定性是人类战争的基本属性。任一作战方无不想要速胜的确定性的战争过程和结果,然而,战争却往往受主客观条件的共同作用而呈现出波诡云谲、难以预测的不确定性。日军全面侵华后,在短短十个月里,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徐州失守,中国大片国土沦丧;与此同时,平型关大捷和台儿庄战役却极大地鼓舞了人心,全国人民都在关注这场战争的进程并期待最终的胜局。在战斗战役胜败交织、战争结果输赢难料的情况下,要想在抗日持久战中转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并且最终争得胜利的确定性结果,这就主要取决于一整套有预见性的、科学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2—45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2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0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2页。

军事指挥方略。毛泽东以其高超的军事谋略,在《论持久战》中全面、客观地阐述了抗战路线和总方针,制定了克敌制胜的一整套具体的军事战略方针和方法原则。

(一) 坚决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

道路决定命运,采用怎样的抗战路线对能否最终取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抗战伊始,国共两党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不敢发动和依靠群众,信奉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并且依赖国外援助的片面抗战路线;与之不同,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主张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早在1937年8月25日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就明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①《论持久战》也强调了这一抗战路线,并且表明抗日战争中日双方“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②“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③在此基础上,抗日政治动员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④唯有充分地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真正的人民战争,才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路线。

(二) 系统阐明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战略总方针亦对整个战争全局起到重要影响,出现偏差就可能左右战局的成败。尽管国民政府在1937年8月正式确定了实行持久消耗战略,但它不是建立在敌我矛盾运动的分析以及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而是简单机械地认为“敌之最高战略为速战速决,而我之最高战略,为消耗持久”。以空间换时间是持久消耗战略的精髓,主张要以广大的空间换时间,消耗敌人的实力,并期待国际援助和干涉来结束战争。^⑤因此,在几次大会战中,国民党都希望拖上敌人三五个月,幻想得到国际同情和干涉,然而,英美等国却采取妥协纵容日本侵略的绥靖政策,这就暴露了国民党在战略指导上的失误。

中共中央早在1935年瓦窑堡会议上就已经预见到战争的持久性,明确提出了对日实行持久战的思想;在洛川会议上正式确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论持久战》更是系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总方针。《论持久战》通篇以中日之间对立的四对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及其发展变化为依据,指明尽管敌我之间的强弱对比决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可能速胜,但同时中国的抗战是反侵略的、正义的、进步的、多助的战争,强调战争最终取胜的主要依靠力量是“中国抗日战线的完成”,是“中国人民的大联合”,^⑥进而深刻阐明了为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以及怎样进行持久战、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的重大问题。经过有理有据、周密严谨的论述,文末掷地有声地重申了令人信服、令敌人惧怕的确定性的战争结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⑦

(三) 科学预见抗战的进程

抗战的局势和进程异常复杂多变,没有人能提前占卜中日战争的“八字运势”;然而,描画战争进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9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0页。

^⑤参见《中国抗日战争史》编写组:《中国抗日战争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57—158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3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5页。

程和趋势的大致轮廓却是军事战略指挥所必需。《论持久战》科学地设想抗日战争时间进程上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通过这个进程，在敌我力量对比上，“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①其中，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②中国的前途命运，不取决于大城市是否在战略防御阶段失守，而决定于全民族在战略相持阶段与敌人血战到底、宁死不屈的拼搏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③

（四）阐明持久战的具体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

《论持久战》强调战争的本质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在战略、战役、战斗和战术等方面都要据此部署和行动。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从战略上来看，敌进攻、我防御，敌处外线、我处内线，敌欲速决、我须持久，因此，毛泽东系统地制定了在抗战第一二个阶段实行战略上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样就能够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就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④

在指挥战役战斗的作战原则方面，《论持久战》则更充分地体现了“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思想，提出要发挥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主动性就是要求主动人为地“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以不意的攻击，即是以战争的不确实性给予敌人，而给自己以尽可能大的确实性，用以争取我之优势和主动，争取我之胜利”。^⑤ 灵活用兵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做这件事需要极大的主观能力，需要克服战争特性中的纷乱、黑暗和不确实性，而从其中找出条理、光明和确实性”。^⑥ “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⑦，因此，战争计划仍可依据其确实性的客观基础而确定而改变，这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节。

综上，正如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 3/4 好像隐藏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⑧毛泽东也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⑨战争本身是不确定的，但抗战的总路线、总方针和总战略可以是有目标、有计划的，具体战略战术可以是灵活的，在客观条件已定的情况下，从扑朔迷离的战争中要主动地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这样才能尽最大可能地保护自己、消灭敌人，争得胜利。《论持久战》的军事指挥方略不仅令国民党高层将领冯玉祥、白崇禧和蒋介石等人先后深感折服，而且令日军司令岗村宁次等人深感是一场难以破解的“阴谋”，而这些也恰恰成为指导抗日战争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取得胜利的“定海神针”。

三、哲学维度：在复杂多变的矛盾运动中洞悉抗战的过程、规律和趋势

尽管“不确定性”和“确定性”不是源于哲学的命题，但“确定性”是哲学自古以来在追寻的结果。

^①《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68—469 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65 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65 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86 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92 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93—494 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95 页。

^⑧[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 1 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 年，第 51 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90 页。

无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有着对世界的“本原”“真理”“规律”等核心命题的思考,这些其实就是对世界“确定性”的探求。直到现代科学对“不确定性”的论证,以及后现代哲学对“确定性”思维的解构,世界的“不确定性”命题才逐渐占据主流。马克思主义哲学突破了西方传统哲学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不确定性”“确定性”无论是从概念还是从范畴的角度来理解,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毛泽东以高超的哲学智慧完成了《论持久战》。这部在实践中坚持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著作,蕴含着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的辩证思维,准确预测了抗战的过程、规律和趋势。

(一) 坚持矛盾分析法,强调用客观和全面的观点考察战争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物的性质、发展过程和结果是由其基本矛盾决定的,抓住了基本矛盾,就能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论持久战》分析了战争双方互相对立的四对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也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①毛泽东以此四对基本矛盾为根据,把中日战争的矛盾发展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揭示抗日战争的性质、内在规律,准确预见了战争的整个发展进程和最终胜利属于中国的结果,制定了在持久战中不断削弱日军优势、增长我方力量、积小胜为大胜的可行性战略战术。与之相反,不能够把握中日战争的基本矛盾,就会只看到纷繁复杂的战争现象而把握不到抗战本质,就不能认识抗战的性质而不能从总体上把握抗战的进程和趋势。“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没能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看待中日战争,“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②因此,毛泽东强调要“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③

(二) 遵循质量互变规律,阐明中国变劣势为优势的抗战过程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矛盾的运动发展过程,由于其内部对立面之间的斗争都表现为由量变到质变,由质变到量变的发展过程,因此,在其发展的长过程中便显出若干阶段性来,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亦如此。敌我双方互相矛盾着的许多特点在战争发展阶段中都将表现为一定的量变和质变,经过艰难的阶段,于我方有利的积极因素才能得以体现,并最终改变其原有的形态。

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矛盾的运动趋势,分析了持久战三个阶段(特别是前两个阶段)中敌我双方有两种不同的变化。一是向上的变化,一是向下的变化。在第一阶段,就我方而言,向下的东西(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减缩)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变化(战争经验、军队和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就敌方而言,也有向上的变化(扩大了领土、人口和资源)和向下的变化(大量的士兵伤亡、巨额军费支出、武器和弹药的消耗、士气颓靡、国际贸易缩减、国际舆论的责备等)这种向上变化是暂时和局部的。第二个阶段,大体上将是日本继续向下,中国继续向上。因此,中国“变劣势为优势和完成反攻准备,是包括中国自己力量的增长、日本困难的增长和国际援助的增长在内的,总合这些力量就能形成中国的优势,完成反攻的准备。”^④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7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8页。

(三) 尊重客观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已经积累了不少指挥打仗的经验:只有正确地认识客观环境和条件,才能最大限度和可能地发挥自觉能动性,克服革命斗争中的艰难险阻,以寡敌众、克敌制胜。因此,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也特别强调要在尊重客观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①人们必须根据客观条件,引出思想、道理和意见,才能制定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政策、战略、战术。

由于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自觉能动性的特点,所以,抗战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客观条件,毛泽东强调:“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②进而,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的指挥员要“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成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而不能“离开客观的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③因此,他主张要打一切有把握之战,避免无把握之仗以及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

(四) 坚持唯物史观,坚定中国抗战必然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念

抗日战争要想取胜究竟该依靠的主体是谁?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还是广大人民群众、抑或是苏联和英美法等国家?显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给出的答案是不一样的。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把群众史观应用于指导战争,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提出人民战争的思想,认为只有广泛动员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才能获得战胜敌人的根本力量。

此外,毛泽东还从阶级斗争引发战争入手,预测了“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必将引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分析了抗战的性质是中国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④虽然我们牺牲会很大、时间也很长,但是最终驱逐日寇和建立新中国的目标一定能实现。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眼光与世界格局,也是抗战最终胜利的必然逻辑。

可以说,毛泽东以深厚的哲学智慧和文化素养,在《论持久战》中灵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战争问题,洞见抗战的过程、驾驭战争的规律、把握抗战必胜的趋势,而这些正是毛泽东打开抗日持久战为什么能必胜的“奥秘之锁”。

四、领导力维度:在或明或暗的较量中彰显革命领袖和党的伟大作用

领导力,是指谁代表最大广大群众的利益和诉求,谁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谋划能力和作战指挥的实操能力,谁就更容易具备吸引、团结、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为了共同的目标愿景而不懈奋斗的能力。抗日战争开始后,尽管中国人民抗日热情被点燃,但是对战争前景仍表现出极大的焦虑和迷茫:谁才能成为这场战争取胜的“指路明灯”,成为这场战争的“中流砥柱”呢?各方力量在或明或暗的较量中左右着抗日战争及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当时国民党力量虽强,但问题已露端倪;中国共产党内,虽然毛泽东在党中央和军队的领导地位已经确定,但是王明的右倾错误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当时也轻视中国共产党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8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6页。

的力量,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显示出其卓越的革命家的政治远见,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论持久战》使得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全军和共产国际的支持

尽管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但是党内仍有不少干部对毛泽东的地位和权威心存质疑,指责他在作战上是“狭隘经验论者”以及“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者”等。特别是1937年11月底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召开了十二月会议,他指责中共中央此前制定的抗战路线。具体来说,王明抹杀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战路线上的原则分歧,否认共产党在抗战中争取领导权的重要意义,否认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把中国共产党的行动限制在国民党蒋介石允许的范围内,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①王明的右倾错误对党的实际工作产生不小影响,对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毛泽东后来回忆这个情况时说:1937年12月会议时,王明回国,进攻中央路线,“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②

面对否定、质疑和孤立,毛泽东保持清醒的头脑,大量研读马列经典著作和军事理论著作,在思想和理论上迅速成长成熟。在抗日战争形势极为错综复杂和革命斗争处在紧急关头的时刻,他娴熟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透彻分析抗日战争,写出军事理论巨著《论持久战》。他的首次演讲,就赢得了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们由衷的信服,就连曾经质疑他理论水平和军事指挥能力的人们也不得不佩服《论持久战》水平之高。可以说,《论持久战》一经问世,就以强大的理论说服力回应了亟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因而,毛泽东也迅速赢得全党全军、国内外爱国抗战人士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吴玉章曾回忆说:“《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③

1938年7月,共产国际也逐渐扭转了错误认识,认识到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该争当领袖,中共中央内部应该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从莫斯科回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明确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二)《论持久战》内蕴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论持久战》全篇贯彻持久战、抗日统一战线和人民战争的思想,并未对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过专门的抗战作用孰轻孰重的对比研究,但是,作为一篇鼓舞中共中央领导干部斗争士气的演讲稿,其中蕴含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自明的。

毛泽东在开篇就指出:“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作英勇的战争,快一年了”^④,其后还总结了坚持抗战有三个因素:“共产党,这是领导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国民党虽也是坚持抗战的,但“因其是依靠英美的,英美不叫它投降,它也就不会投降”;还有“大多数是反对妥协、拥护抗战的”党派。^⑤在此,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抗战决心和立场已有明显体现。

《论持久战》在分析中国最终必胜的原因时,强调虽然当时中国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实力上都弱于日本,但中国“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

^①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第199页。

^②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663页。

^③转引自陈晋:《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怎样确立的》,《新湘评论》2010年第10期。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9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5页。

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①中国共产党有着十七年的革命经验，“这些经验，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教育了中国的政党，今天恰好作了团结抗日的基础。”^②这是中国抗战中的进步因素；与之相对，阻碍进步的因素是历史积累下来的国民党的腐败问题。尽管文中阐述进步和腐败的存在只是为了进一步说明革命战争是抗毒素，能够清除敌人之毒焰和自身之污浊，中日战争终将胜利并且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但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谁进步、谁落后已经高下立判了。

《论持久战》还分析了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在抗战第一阶段，虽然游击战为辅助作战形式，却可乘敌后空虚而发展，广泛建立敌后根据地，迫使敌人从进攻转向保守占领地，从而对敌之进攻带来压力和羁绊；第二阶段，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削弱敌之军队，缩小敌之占领地，逐渐扭转敌我力量对比，为实行战略反攻准备条件；第三阶段，原来的游击军从游击战转向运动战，承担一部分或许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作战任务。因此，“从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③毛泽东还强调八路军的方针就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④由此可见，八路军在抗战中也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相应，毛泽东还指出国民党在第一阶段作战指挥中有误，强调“阵地战虽在此阶段之第一期，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观错误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从全阶段看，仍然是辅助的。”^⑤阵地战虽能消耗敌之有生力量，但自身也消耗过大。历史是最好的证明。1938年，当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中连连败北之时，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在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稳稳地站住了脚跟，开辟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游击战，为抗战胜利带来了新希望。

《论持久战》中还指出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宣传动员不利的问题：“有的一些，沧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必须切实地改一改”。^⑥没有大力宣传，也没有采用民众喜欢的方式方法，和民众有隔膜，说明动员效果不好。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国民党政府由于自身的阶段局限性，很难在艰辛晦暗的抗日战争中赢得民心民意，最终也难以避免民心的天平倾向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一边。

概言之，当民族和阶级矛盾摆在国人面前时，毛泽东通过《论持久战》以卓越的政治家的远见赢得了全党全军全民的爱戴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也阐明并号召共产党人在抗战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不仅彰显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革命领导力，也成为抗战朝着必胜的方向前行的“指路明灯”。

五、现实启示：在大变局中坚定不移地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这不仅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留下的宝贵智慧，也是我国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面临的严峻任务。尽管今天距离《论持久战》问世已经过去85年了，和平与发展早已成为时代主题，我国也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然而，当今世界的不安全不确定性因素正在增多，“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0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3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1页。

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①经典启迪智慧，历史照亮未来；踏上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可以从经典中汲取经验和力量，更加主动地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更加坚定地在大变局中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毛泽东不仅善于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分析时代，还更立足于时代大势，提出了把中国抗日战争放入世界反法西斯战线来考量的高人一筹的战略洞见。今天，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依然是中国共产党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前提。着眼“两个大局”，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和形态的高度，高瞻远瞩地指明：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②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它不同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也不走对外掠夺扩张的西式现代化老路，而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幸福的现代化新路，也将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做出新贡献。

（二）要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论持久战》问世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以稳固，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和成熟稳定的领导核心，并成为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当今世界正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对此，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两个确立”的重大论断，这亦是时代呼唤、历史选择、民心所向，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因此，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全党必须提供政治站位，努力把“两个确立”转化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自觉行动，才能使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共同筑起防范化解各种风险挑战的铜墙铁壁和钢铁长城。

（三）要善于运用哲学方法和智慧，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

毛泽东充分运用矛盾分析法分析抗战特点及演化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及具体战略方针。在新征程上，我国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我们要充分运用科学思维和哲学方法分析现实问题，以正确的战略策略在变局中开新局，把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③，要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研判危与机，掌握危中寻机、变中求进的战略策略，善于运用系统观念，坚持底线思维，把握历史大势，牢牢把握战略主动，始终站在公道正义、历史正确和人类文明的一边，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世界永续和平发展贡献力量。

（四）要牢牢坚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立场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预见抗日战争必胜，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动员和依靠群众、发动了一场人民战争，人民是党的力量之源和抗战的胜利之本。可以说，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6页。

^②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③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8—19页。

本政治立场，共产党人的最高利益和核心价值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① 赢得人民信任和支持，也是党在新征程上克服任何艰难险阻、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之源。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复杂多变，只要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做到“三个务必”，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紧紧依靠群众开展伟大斗争，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就一定能够打赢各类遭遇战、攻坚战和持久战！

（责任编辑：陈 雪）

A Masterpiece of Grasping Certainty in the Midst of Uncertainties: Re-reading Mao Zedong's *On Protracted War*

WANG Miao

Abstract: How to grasp certainty in the midst of uncertainties is not only a hot topic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military security at present but also a task of the times that China must face in the new journey of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enhance our ability in this regard, we can get new inspiration from revisiting some classics. As early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Japanese all-out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Mao Zedong created his classic *On Protracted War* which is a military theoretical masterpiece characterized by grasping certainty in the midst of uncertainties. To be specific, through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in the turbulent situation, this great work drew up military command strategies in the confusing war situation, revealed the nature, the laws and the trend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in the complex and changeable contradictions and their movements, and manifested the correct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ts leader in the contest of various revolutionary forces. It not only foresaw the definitive answer that the War of Resistance was a protracted war and would eventually be won, but also painted a clear outline of the victory of a protracted war. *On Protracted War* is still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us to open up a new situation in the midst of changes, grasp certainty in the midst of uncertainties, and unswervingly take the road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Mao Zedong; *On Protracted War*;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uncertainties; certainty

About the author: WANG Miao, PhD in Philosophy,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